

现代政治分析



罗伯特·A·达尔著

会主义，就必然要放眼世界，引进和借鉴当代世界的先进文化成果。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就是立足中国，立足当代，精选当今世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有重大影响、新观点

业正在经历着深刻而巨大的变革。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日新月异，标志着人类认识和揭示自然奥秘的飞跃和深化。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冲击下，在当代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崛起了一大批崭新的学科、思潮和观点，以期解决世界向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现代政治 分析

著者/[美] 罗伯特·A·达尔

译者/王沪宁 陈峰

● 上海译文出版社

Robert A. Dahl

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根据美国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普兰蒂斯-霍尔

出版公司 1984 年第四版译出

现代政治分析

[美]罗伯特·A·达尔 著

王沪宁 陈 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43,000

1987 年 3 月第 1 版 198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82,000 册

书号: 3188·81 定价: 1.85 元

内部发行

译者的话

罗伯特·A·达尔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一位代表人物。《现代政治分析》是他的一部重要的政治学著作，初版于1963年，至1984年出了第四版，其间作过大幅度的增删，第四版与第一版已大为不同。可以说，《现代政治分析》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经典著作”之一。

行为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风行的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战后国际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西方社会在内政外交上矛盾重重的景况，以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促使西方政治学家检讨传统的研究方法。结果在“纯科学”观念的主导下，行为主义政治学应运而生。行为主义学派断定，古典政治学理论的方法，如历史分析方法、法律分析方法和机构分析方法，带有浓厚的道德和哲学色彩。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必须彻底抛弃这种方法，对政治现象作“系统的、经验的和因果的解释”，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经验科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尤其强调规则性、验证、技术、数量确定、价值、系统化、纯科学和一体化。《现代政治分析》最初就是在行为主义的鼎盛时期写成的，自然具有浓厚的行为主义色彩。

37/26

罗伯特·达尔 1915 年出生于美国艾奥瓦州。1940 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此后曾任福特研究教授、美国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政治学会会长(1966—1967 年)、美国科学院院士。后来他一直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斯特林政治学教授。达尔著述甚丰,他的主要著作除本书外有:《国会和对外政策》(1949 年)、《民主理论导言》(1956 年)、《谁在统治——美国一个城市中的民主制度和权力》(1961 年)、《美国的多元主义民主制:冲突和一致》(1967 年)、《革命以后:美好社会中的权威》(1970 年)、《多头政制:参与和反对》(1971 年),以及最新的著作《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1982 年)。这些著作围绕着两个重要的课题:一是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加以分析和研究的政治多元主义,二是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他的著作在西方政治学界有较大的影响。

《现代政治分析》一书实际上是一本阐述其政治学方法论的著作。虽然篇幅不大,但对于理解达尔以至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都是很有价值的。《现代政治分析》第一章分析了政治分析的意义。一个人无论是否喜欢政治,都不能全然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因此,人们必须理解和懂得政治。要

分析和理解政治，则应从政策、规范、原因和意义四个取向上去观察。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逻辑关系：选择政策取决于政治规范，政治规范又取决于实验验证的原因，而实验的结论又取决于用来表述的术语的确定含义。这四个取向是该书的基本框架。达尔采用了逆溯的方法，即含义——原因——规范——选择。第二章分析了政治的概念。作者在把政治的概念转移到政治体系的概念分析上之后，提出了一个宽泛的定义：任何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和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就是一个政治体系。这样，政治就成了无所不包的现象了。在这个视角下，达尔分析了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的差别、体系与次体系的关系、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的关联、政府与国家的关系。第三章分析了政治影响力和权力的概念。作者把权力、影响力、权威、控制、说服、强权、武力、强制等形形色色的术语都糅成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影响力术语”，用以表述权力的概念。达尔批驳了权力硬块说、权力与资源混淆的观念和报酬与剥夺混淆的观念，确定影响力为A影响B在某些方面改变自己的行动或倾向的能力。他还分析了明显的影响力和暗含的影响力两种形式以及影响

力的量的确定。第四章分析了政治影响力的各种主要形式。影响力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如训练成的控制、说服和引诱等形式。在这里，还分析了权力、强制、武力等概念。达尔指出：采用何种影响力形式意味着会有怎样的政治生活样式，因而具有不可忽略的道德意义和实际意义。第五章分析了各种政治体系的相似性。任何政治体系都有某些必不可少的相似性，政治体系的特征是功能专业化、遗传差异、社会动机差异等因素造成的。政治体制的相似性表现在政治资源的不均匀的控制性、目标的冲突、合法性的取得、意识形态的发展、其他政治体系的影响等方面。但政治体系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不确定性是政治生活无法回避的特点。第六章分析了各种政治体系的差异性。各个政治体系之间存在着难以计数和形形色色的差别和不同。形成各个政治体系互不相同的原因，包括历史的渊源、社会经济水平、政治资源和政治技能的分配、分裂与融合的基础、政治冲突的激烈程度、分享和行使权力的体制。达尔认为选举权的范围和反对的自由程度决定了政治体系的不同。他提出了自己的划分标准，即大众政制(或多头政制)和霸权政制两大类，而中间

存在着诸多难以划分的混和政制。第七章分析了有利于和不利于民主政制形式的条件。达尔从影响力形式的差异、冲突层次的差异、分享和实施权力的体制的差异以及第六章涉及的各种因素分析了大众政制和霸权政制形成和变化的条件。作者表述了他的一个观念：历史进化最终会达成和平的大众政制。第八章分析了个人在政治体系中的行为。达尔把各类人分为无政治阶层、政治阶层、谋求权力者和有权者这样四个阶层，分别论述了他们各自形成的原因和条件。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政治人”的动机、激励、意向、个性，分析了“民主人”、“专制人”、“鼓动者”和“协商者”、“实用主义政客”等个性种类对个人政治行为的影响。第九章是本书第四版新增的一章，分析了政治规范的问题。达尔在政治哲学复兴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政治哲学衰落和再次复兴的原因。他在这章确认了政治哲学、道德问题、规范争议在现代社会中的持久性。第十章分析了政策选择的方式。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人们就必须选择一定的政策。政策选择要求人们能够测量政治现象，要求人们有良好的制定政策的战略。第十一章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参考书目。全书结构清晰，论述

深入浅出，将政治学研究的各个重要问题勾勒出来，并引用实例加以论证。这方面的特点也是《现代政治分析》长期来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

《现代政治分析》，顾名思义，是一本以社会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著作。然而，《现代政治分析》一书之所以历时二十余年一直是政治学的必读之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达尔没有把它写成一本描绘和解释具体政治现象的著作，而是试图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在政治学研究史上，各类以具体政治现象为对象的著作数不胜数，但其中大部分都会因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政治现象的变革而被淘汰，成为历史。达尔在现代科学观念的影响下，试图超越传统的形式——法律研究方法，创立一种适应二十世纪科学“范式”的分析框架，这促使他成为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派的佼佼者之一。正如达尔本人在第一章中所言：“本书并不提供答案，而只是提供以明智的方法寻求答案所需要的一些分析工具。”

无容置疑，达尔尽管是一位较为严肃的学者，但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发展的分析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理论不甚

了了。例如，他认为马克思断言到了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一切迄今引起变化的力量据信都会消失”（本书第86页）。其实，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曲解。马克思的精髓思想在于：人类社会处在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产生。在各种力量的交替运动中，人类社会从低级走向高级。

达尔作为一位西方政治学者有其独到的学术观点。在《现代政治分析》第四版中，他有意增加了一章，即第九章“政治评价”，用来探讨他在第一章最后提出的问题：我们怎么会知道什么是政治中最好的呢？信奉民主是否仅仅出于爱好或偏见？我们可否合理而明智地在多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中进行选择呢？如何选择呢？这些问题实际上引导人们回复到传统政治学研究的轨道上去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举动。

我们知道，行为主义政治学是作为与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相对立的学派出现的，它的基本命题是政治学最终可以成为一门能对政治现象加以解释和预测的科学。政治学研究应当充分定量，依靠定量来精确说明各种关系和规则，尤其重要的是，政治学应当力求排除“价值观念”、“价值偏

好”，即所谓“价值劫除”或“价值中立”。^①这种“纯科学”的研究倾向在五、六十年代之所以兴盛，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它与当时世界上喧闹一时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观念密切相关，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思潮。行为主义的这一方向意味着对政治哲学（规范理论）的否定。正如反行为主义政治学家们尖锐地指出的那样：社会重大的政治问题必然要涉及道德和伦理问题。政治学研究必须关心价值、规范、是非问题，否则政治学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政治学永远不可能是“中立”的。^②这场争论在政治学界持续了多年，直到六十年代末，行为主义政治学才遇到了真正的危机。六十年代，世界上风云变幻，西方社会危机重重。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学生运动倏然爆发，种族歧视激起黑人奋勇反抗，贫富悬殊不断造成社会冲突，社会道德风气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主义政治学受到严峻考验而濒于衰落。行为主义搞“纯科学”研究，不关心社会实际生活

① 艾伯特·索米特，约瑟夫·塔德豪斯：《美国政治科学的发展》（纽约，艾温顿出版公司，1982年），第179页。

② 马丹·G·甘地：《现代政治分析》，第2版（新德里，牛津和IBH出版公司，1981年），第19页。

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不对人类的种种需要作出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则是其致命的缺陷。与此同时，在更宏观的范围中，“再意识形态化”的口号取代了“非意识形态化”的口号。行为主义政治学终于在四面楚歌中发生了嬗变。1969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伊斯顿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发表了以《政治学的新革命》为题的就职演说，他指出：“目前美国政治学中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让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取代了，而新的革命正在发生。我把这个新的挑战称之为后行为主义革命。”后行为主义是行为主义的继续，也是行为主义在困境中不得不选择的出路。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突出了价值和道德研究的作用和地位。^①显而易见，达尔也接受了这个总体性转弯。新增的第九章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这也标志着他对行为主义本身的某种检讨。他在第四版序中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价值倾向：“这个版本反映了一个

^① 参见弗莱德·I·格林斯坦，尼尔森·W·波斯毕：《政治学手册》，第1卷，“政治学：范围和理论”（艾迪生—韦斯利出版公司，1975年），第113—116页。

新近的、重要的、并且我希望是持久的变化——英美政治哲学亦即规范政治理论的复兴。”

由此，我们便不难发现第九章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它不仅反映了达尔本人的观念变化，而且也反映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甚至一般思维方式的重要变化。达尔在展开第九章的论述时，选择了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约翰·罗尔斯作为依托点。达尔说：“我立足于《正义论》这个方便的有利地位，从那里眺望所发生的情况。”约翰·罗尔斯系新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以反功利主义作为自己理论体系建设的前提。他的政治哲学具有十分浓郁的传统方法论的色彩。他的《正义论》打破了政治哲学长久以来的沉寂，在西方政治学领域内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达尔欢呼《正义论》的问世，认为该书在英语国家中是对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贡献”。然而，达尔忽视了罗尔斯政治哲学本身的重大缺陷。罗尔斯是改良主义者，其基本前提是维护西方既存的制度。既然他强调正义原则是绝对优先的，正义原则又是从一种“想象的原始协议”中推演出来的，那么这种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就超越了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混淆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制

约关系，把设定的“天赋人权”的抽象概念当作评判标准。这里的不科学性与十八世纪的自然法学派是一样的。分析一个具体的社会，应该从该社会的物质关系和精神关系出发。在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人们，对正义概念本身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达尔之所以要增加第九章，正是为了表明他对政治哲学的看法。他批评本世纪以来的政治哲学研究死气沉沉，缺乏创造性。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本世纪的政治哲学是躺在前人的或古人的著作上生活，满足于解释和介绍前人的理论体系和观点；二是在汹涌澎湃的经验主义浪潮中，集中地去实证分析投票行为、选举、选举制度、政党、政治发展、民主的条件、民主政制、国际关系等课题，而偏废了对政治规范问题的探索。除这两项原因之外，达尔认为主观主义、实证主义（包括其各种现代形式，如逻辑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或科学经验主义等）、决定论都不利于政治哲学的发展，乃致造成了西方政治哲学的衰落。直到《正义论》出版，这一万马齐喑的局面才被冲破。达尔相信政治哲学研究能够推动经验研究，可以为经验研究提供标准。实际上，行为主义政治学不在这方面有所改造，就不可能克

服这个学派本身所遇到的矛盾和危机。重新评价政治哲学的作用，是行为主义政治学摆脱自身困境的一条出路。达尔从“罗尔斯热”中看到了一些不容否定的事实：(1)科学进步并未消灭政治哲学；(2)道德问题依然是众所关心的对象；(3)政治哲学必然充满争论，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是这样，因为人们在理论基础、关键概念的意义上必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实际上是他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缺点的批评，也是他对学派未来发展的设想。

显然，《现代政治分析》明白无误地表现了达尔的价值倾向。他对政治现象的评判标准完全基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生活的模式，把西方社会经过漫长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政治生活模式以及从中得出的原则，片面地当作评判一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标准，以此确定是非高低，孰优孰劣。无论是出于明确的意识形态，还是出于某种心理沉淀，这种价值倾向是西方政治学者的通病。在《现代政治分析》中，读者无疑会看到这种倾向充分表现在他对“多头政制”的看法上。达尔盛名于西方政治学界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界最有影响的研究政治多元主义的学者。他把当代西方

社会的政治体系视为一个多元的体系,各种力量、集团、组织、人物在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中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政治体系的活动格局和内容。他认为:“当两个人发生冲突时……他们面临着三种主要的选择:僵持、强制或和平协调。”^①前两种方法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人们日益倾向于采用第三种方式来解决政治生活的冲突。所谓“和平协调”是指咨询、谈判和寻求双方有利的方案。达尔断定,这样一个基本认识构成了政治多元主义的基础。显然,这是从西方政治生活中抽象出来的模式,且不论西方政制本身存在的种种问题。因此,达尔在本书中以这个模式作为评判标准,把他认为在标准以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划为“大众政制”或“民主政制”,而把他认为在标准以外的划为“霸权政制”、“混合政制”,而全然无视各国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这自然是某些西方学者的一种由来已久的偏见。他们不能预见到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实现高度民主创造了根本性条件,因而必将成为一个具有真正的高度民主的政制的前景。而且,历史将不断地揭示:每个国家最终都

^① 泰奥多尔·J·洛威:《自由主义的终结:意识形态、政策和公共权威的危机》(纽约,诺顿公司,1969年),第51页。

会逐渐形成最适合于广大人民意愿的合理的政治
体系。

王沪宁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

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